



21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

建议“十三五”开建内陆核电站

本报记者 刘芳

正在举行的全国两会上，由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贺禹发起，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干勇等21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向大会提交了题为《推动核电新一轮规模发展，实现中长期国家能源结构调整战略目标》政协提案。贺禹建议，明确核电在我国能源电力供应中的支柱地位，以沿海扩建项目为重点，同时争取“十三五”初期在内陆开建首批核电项目。

3月7日，贺禹在就相关问题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满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能源刚性需求及节能减排的刚性要求硬约束条件下，核电替代效应最强，应该规模化发展。据贺禹介绍，在2014年11月发布

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我国提出计划到203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据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等机构测算，2030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60亿吨标煤左右。这意味着届时非化石能源的供应量要达到1.5亿吨标煤左右。在考虑最大发展潜力情况下，到2030年，我国风电、水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折合标煤合计将达到8.7亿吨，剩余3.3亿吨的缺口则需要由核电来填补。

“由此推算，要实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达到20%左右的目标，核电装机规模需要达到1.5亿~2亿千瓦。”据此，贺禹建议，应从国家战略层面进一步明确核电在我国能源电力供应中的支柱地位，实现核电在我国规模化发展。

目前，我国核电在运装机容量2028万千瓦，在建装机容量2800万千瓦。如果在15年的时间中增加到1.5亿~2亿千瓦，我国核电准备好了吗？贺禹表示，我国核电已经具备规模化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贺禹表示，经过近30年的不间断发展，特别是“十一五”以来的快速发展，我国形成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具备了规模化发展核电的技术能力。同时，我国已形成较强的产业链配套能力，我国核电装备制造产能已达10~12台套/年，工程建设能力可以满足30~50台机组同时建设。此外，人才培养和储备体系不断完善，近10年来各核电企业持续培养了大批人才，很好地满足了我国核电研发设计、工程建设及生产运营的需要。核燃料供

应保障充分，近10年来几家主要核电企业在海外铀资源开发方面持续取得突破性进展，完全能够满足后续核电规模发展的需要。

近几年，我国没有新的核电项目开工，装备制造产能放空，我国核电发展进入了“断档期”。贺禹建议，应在全力推动完成引进三代核电技术消化吸收以及依托项目建设的同时，按照“同一厂址，同一技术路线”的原则，以沿海扩建项目为重点，采用满足国家核安全标准要求、具备三代技术主要特征的成熟堆型技术填补空白，以推动核电产业整体上地健康、有序、不间断地发展。

目前，我国的核电站均建设在沿海地区，1.5亿~2亿千瓦的核电装机将如何布局？贺禹建议，应尽快启动内陆核电建设。

贺禹表示，从全球看，内陆核电具有丰富的建设运行经验和良好的运行业绩，国际上也不区分沿海和内陆核电，两者没有必然差别。截至2014年年底，全球超过一半（57.9%）的在运核电机组位于内陆地区。主要核电大国中，美国、法国、俄罗斯内陆核电比例均高于60%，安全性已得到充分验证。实践表明，内陆与沿海核电在设计、建设和运营上标准是一致的。

“我国已基本完成内陆核电前期准备和论证。‘两湖一江’（即湖南、湖北、江西——记者注）三个内陆核电项目现场准备已达到随时开工的条件。”贺禹建议，我国应将内陆核电建设真正提上议事日程，争取在“十三五”初期实现首批内陆核电项目开工建设。



本报记者 白雪 实习生 王林

酝酿超过20年，连续多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存款保险制度出台，是今年“板上钉钉”的硬任务。李克强总理今年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到，推出存款保险制度，这一制度，指的是存款银行交纳保费形成存款保险基金，当个别银行经营出现问题时，使用存款保险基金依照规定对存款人进行及时偿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表示，应该全面认识存款保险制度实施的意义。他表示，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是为了建设一个更稳定、更健康的金融环境，有利于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督促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经营更稳健。“因为存款保险机构不可能稀里糊涂闭着眼睛就同意保险，必须要了解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是否稳健，风险是不是大。”如此一来，存款保险机构变成一种准监管机构，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平稳健康运行有积极作用。

全球目前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存款保险机制。我国早在1993年就提出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2007年曾准备推出这一制度，但2008年碰到国际金融危机，被暂时搁置，历经种种曲折，到今年，总算“千呼万唤始出来”。

杨凯生表示，存款保险制度出台之后，会使金融机构更理性地吸收存款或进行资产经营的风险定价，也会让社会公众更理性地注意各家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是否稳健，“这些都是利率市场化的前提条件”。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建国看来，利率市场化改革目前已到临门一脚的关键时刻，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风险偏好变化与信用风险爆发的几率增加，需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防范系统性风险。

存款保险制度的费率如何确定？杨凯生表示，存款保险制度实施初期，会实施统一的费率。目前世界上实施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有统一费率也有差异性费率。统一费率最大的好处是便于操作、便于实施，马上就可以出台。差异性费率，则有利于存款保险机构判断吸收存款机构的风险程度，风险大费率就高，风险小费率就低。但是差异性费率比较复杂的，技术上有一定的要求。“先实行统一费率，之后条件成熟再逐步过渡到差异性费率，是比较可行的选择。”

法院检察院 跨区域”改革遇 授权栏杆”

本报北京3月9日电（记者张国）今天，出席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蔡平在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指出，我国正在推行的法院、检察院“跨区域”改革再往下走很困难。

作为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一步，3月6日，新组建的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在东莞市实现了第一次巡回就地办案。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方向，我国还将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跨地区案件。目前，北京、上海作为试点，已经分别组建了跨行政区划的中级人民法院。

蔡平表示，设立跨区域法院、检察院，有助于克服饱受诟病的“地方保护主义”、“主客场”问题，推动司法公正。但是，“跨区域”面临巨大的法律门槛。司法改革的很多方面，都需要在立法调整的基础上往前推动。他告诉记者，最高法巡回法庭代替不了地方法院，因为它所能受理的案件，仍然在最高法的受理范围之内，只是让人们到最高法打官司可以不用去北京了。

蔡平说，按照现在的改革方式，再往下走“就很困难了”。如果在基层设立跨区域法院，跟法院对应的人大是哪一级、跨区域法院法官怎样产生，都是现实中存在的难题。在场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王万宾听后立即表示，蔡平代表提出的这一点意见非常重要。王万宾说，问题的实质是“权力来源问题”。

王万宾指出，按照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各级“一府两院”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北京市海淀区人大常委会产生的法院，要跨到另外一个区去，管朝阳区的事，怎么对应？上海市人大任命的那个，可不可以管辖北京的事情？我这个地区的人大，能不能决定你那个地区的权力？这些在法律上都有问题”。

蔡平表示，希望全国人大常委会能从立法角度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否则的话，这项改革走下去“总是磕磕绊绊”。

国内首部法治公益微电影首映

本报北京3月9日电（记者苗晓雨）国内首部法治公益微电影《寻人启事》今天在最高人民法院举行首映式。微电影聚焦司法“执行难”，由最高人民法院影视中心与山东省即墨市人民法院合作出品，UMG联播传媒承制。微电影《寻人启事》以即墨市人民法院工作为素材，刻画了一个被执行人被法院“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台”曝光后遭遇的种种困境，剧情充满了矛盾冲突和戏剧反转。

近年来，“执行难”已经成为司法实践领域的顽疾。去年以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在最高法统一部署下，利用官方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通过设立“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台”，对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义务的被执行人进行曝光，同时限制失信被执行人的经营和高消费行为，迫使一大批失信被执行人不得不主动履行法院判决，这也是该微电影拍摄制作的背景。

（上接1版）

陈舒认为，司法改革，立法先行，选好试验田很重要，立法先行很重要，要摒弃过去那种“遇到绿灯快点走，遇到红灯绕着走”的思维。

全国政协委员段祺华深知此举意义重大。“立法和改革是相辅相成的，不先立法，改革依照什么去推进？”段祺华坦言，很多时候，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旧有的法律推行跟不上，才发现一些法律要被修改或制定了。段祺华说，改革没有法律护航，政府就容易“任性”，容易乱作为。“我们应该做的是加快立法步伐，让它跟上改革的脚步，甚至走在改革的前面。”

对于法无据的改革，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律师协会会长韩德云用了个更形象的说法：“先生孩子后办证”。

“一些行政机关觉得立法孩子事，就怎么方便怎么来。”韩德云说，行政机关不同于立法机关，往往更注重效率。“但通过行政决定做的事，寿命一般不超过5年。”领导的任期一到，人一走，改革就很难进行不下去了。“这就是为什么强调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韩德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重大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并保证其长期性和稳定性。

在他看来，提高立法质量，恰恰是确保立法能够顺利推动改革进行的关键。“目前的问题，主要出在立法质量比较差上。越往地方走，越概念化，越空洞。”韩德云强调，“只有立法质量提高了，才能做到于法有据”。

开放、法治的上海自贸区，给了雄心勃勃的于曙光更多大胆设想，他要在两年内，让新公司成为互联网金融业内领先的新兴公司。

两会上，粤津闽的负责人都表示，三大自贸区总体方案都已浮出水面，挂牌进入倒计时，更多的“于曙光们”将从中受益。

本报北京3月9日电



3月9日，天津代表团全体会议向中外媒体开放，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委书记回晋记者提问。当日，京津冀一体化问题备受媒体关注。

本报记者 杨姣/摄

河北省委书记回应马超群“小官巨腐”案

本报北京3月9日电（记者雷宇邢婷）今天下午的河北代表团开放日活动上，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在回应秦皇岛马超群案时称，“在河北，‘不敢腐’的氛围初步形成”。

2014年，秦皇岛市城市管理局原调研员、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被查处，因1.2亿元现金、37公斤黄金、68套房产手续的贪污所得，震惊全国。

据介绍，2014年，河北省巡视发现的问题是2013年的3.6倍，河北省纪委

对涉嫌违纪的省管干部已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审查的为39人，查处省管干部数是前十年总和；立案查处的县处级领导干部，同比增长了175%；查处了一批像马超群这样“小官巨腐”案件。

周本顺表示，目前河北省反腐形势依然严峻。下一步河北反腐任务非常艰巨，将进一步加大反腐力度，从已经查处案件中吸取教训，像治理生态环境一样，把净化政治生态作为重要的任期目标，把暂时不敢腐变成长久不敢腐，直至形成习惯和自觉。

河北省省长张庆伟：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即将颁布

本报北京3月9日电（记者雷宇邢婷）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省长张庆伟在河北代表团今日举行的开放日活动上表示，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对河北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冀一体化战略，河北和北京、天津共同制定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很快就会颁布；河北和北京、天津开展了对口合作，签署多项协议；在交通、生态环境、产业协同发展方面率先取得突破；三地组建了4个平台，成立了多家整合区域资源的大公司。

全国人大代表、安庆市委书记虞爱华：

领导干部要有拎着乌纱帽搞改革的勇气

本报记者 王磊

今年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两处提及“为官不为”，不少代表、委员就此展开热议。

全国人大代表、安庆市委书记虞爱华将部分基层干部在改革创新中畏手畏尾的现象总结为六种倾向：“坐等改革”，等顶层设计，等上级部署，等外地经验；“害怕改革”，怕失去自身的既有利益，怕得罪既得利益者，怕失误而丢“乌纱帽”；“空谈

改革”，逢会必讲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比划改革”，一招一式看似像那么一回事，其实并未动真碰硬、攻坚克难；“异化改革”，不是把改革当作常规工作，而是把常规工作说成是改革；“不会改革”，面对发展中的难题不会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面对改革中的问题又不会在深化改革中化解。

虞爱华表示，领导干部要有拎着乌纱帽搞改革的勇气，而不是捂着乌纱帽怕改革，当务之急是建立一套科

学的评价激励机制，注重吸纳民意评价，以注重对推动改革的效果作为评价和选拔干部的重要内容，“让会干事的上去，不干事的下去，干坏事的人进去”。

“谁真干事就支持谁，谁干成事就使用谁。”近段时间以来，安庆市委市政府坚持完善干部人事制度，建立县级职位人选实名推荐制度，县（市区）党委和市直单位党组（党委）作为推荐主体，主要负责负责人签字署名，实行“谁提名、谁负责”，从源头上把好选人用

人关；同时坚持依靠制度防腐反腐，出台了《市直单位党政正职“三个不直接分管”暂行规定》，规定党政正职不得直接分管财务、干部人事和工程项目，建立起“正职统揽、副职分管、集体领导、民主决策”的权力运行制约机制。

此外，安庆着力转变政府职能，为市场主体减压松绑，大刀阔斧地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打造安徽的“三最城市”（审批项目最少、时间最短、收费最低）。安庆市相关部门全面清理整顿行业协会，该市协会由234家减少到

191家，在协会兼职的159名副县级以上干部全部退出。

与此同时，安庆围绕改善民生抓改革，推进社会事业领域创新，不断完善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始终把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放在心上、抓在手上。在促进教育公平上，安庆落实城区“零择校”政策，“不接一张条子，不打一声招呼，不开一个口子”。

“为官有为，可能会面临一定的风险和压力，但是为官不为，就是对党不忠诚，对人民不尽责。”虞爱华坦言，改革创新中需要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注意方式和方法，只要是符合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事，只要是遵循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事，只要是对绝大多数老百姓有益的事，就应该雷厉风行决策、义无反顾推进。

全国政协委员：

百万大学毕业生创业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

本报记者 白雪 刘星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创新创业的引擎里，青年至关重要。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子学会秘书长徐晓兰今天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大会发言时表示，在我国经济发展增速换挡和结构升级中，要高度重视新增就业群体中近800万大学毕业生和海归留学生的就业创业。

徐晓兰介绍说，2014年，致公党中央先后组织了关于大学生创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创客空间等系列调

研。调研结论认为，随着当前互联网普及和开源软件和硬件、3D打印、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创业的技术门槛和成本降低；网络社交促进了创业者的奇思妙想和市场需求对接；创业投资细分和创业孵化、服务的社会化都有利于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局面。目前，分布于各地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高新区的企业孵化器有1600多家，在孵企业8万多家，就业人数达175万人，为大众创新创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全国政协委员、知名经济学家钱颖一提出，中国经济下行主要是源于

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对过去经济中结构扭曲的纠正以及政府激励机制的改变。在他看来，解决问题不能再靠大幅度的政策刺激或者依赖央行的货币政策。“当今技术变化，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非常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温思美表示，现在起到2020年，我国将有4500多万名大学生毕业，即使按目前的大学生创业率计算，也将至少有百万大学毕业生走上创业之路。“他们的创业能力和创业层次，对我国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温思美建议，高等院校可以适应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需要，设计更加灵活先进的学习制度和模式，努力提升高校的创业教育水平；政府可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增加创业资金量和受益面；鼓励更多的创业成功人士走进高校，走进课堂，与大学生分享创业者的酸甜苦辣，激励更多的大学生走上创业之路。“在社会上真正形成一种勇于创业、尊重创业、敢于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风尚”。

在徐晓兰看来，构建开放式创业常态系统也很重要。在研究车库咖啡、创客空间、创新车间等基础上，她建议

李稻葵委员：应设立专门的长期建设基金

本报记者 刘星 白雪

“融资难、融资贵是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拦路虎。”今天下午，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大会发言时，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把自己的关注点放在了融资难、融资贵上。

“借贷如讨债：讨一元十元叫乞丐，讨一千万叫讨债。”这是李稻葵经常听到的抱怨。他说，融资难表现在实体经济的融资渠道非常狭窄，

主要的融资渠道仍然是银行和信托，“在企业亟须再融资时，银行承诺企业先还后贷，企业好不容易借西那把资金还给银行，银行却迟迟不贷新贷款，形成了对企业逼债式的周期性钱荒”。

此外，他还指出，中国实体经济企业融资成本之高在全世界都很少见：“当前，我国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大大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而实际利率一般都要在基准利率之上大幅上浮，信托则需要高于10%的放款利率。”

他表示，中国经济不缺少储蓄这个融资的源泉，“融资难、融资贵不是中国经济货币存量不足。相反，中国经济的货币存量与名义GDP之比近200%，绝对值近20万亿美元，两者基本都是世界之最。因此，简单地放松货币政策，不解问题之本”。

李稻葵表示，融资难、融资贵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日益加剧的融资结构、投资结构严重不匹配。中国经济的融资结构是以银行贷款及信托等短期融资为主，而投资却已经从房地产及生产能力建设这些相对比较短期

的投资项目，转向高铁、城市基础设施等回款周期往往长达20年甚至30年的投资项目，这使得银行剩下来可以给企业的贷款量非常有限，引发了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我们的金融体系就好比一个副食品店，应该是既卖酱油又卖盐。卤茶叶蛋的打酱油，腌咸菜的买盐。”李稻葵说，“而现在，这个副食品店只卖酱油不卖盐。搞得腌咸菜的必须打酱油替代盐，因此，副食品店里卤茶叶蛋的和腌咸菜的都排着长队打酱油，酱油的价格随之节节高。”李稻

葵说，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融资难、融资贵这一难题，必须从金融体制改革改革上狠下功夫。

他建议，把长期基础建设的融资从商业银行和信托中剔除出去，建立专门的针对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的长期建设基金，学习世界银行等国际开发机构的融资办法，由政府出种子资金，再提供担保，然后面向资本市场发行可流转的长期债券。“这样才能减少基础设施项目对银行系统信贷资源的占用，解决‘打酱油排队’的问题，而且能够使长期基础建设的融资独立于各级政府”。

“加快金融改革，打掉融资难、融资贵这个拦路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必将随之加快。”李稻葵这样总结。

本报北京3月9日电